

文史知识文库

怎样读历史古籍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K204
16

0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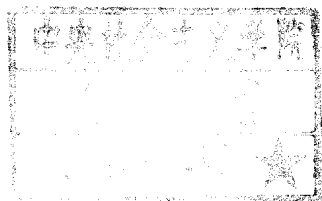
文史知识文库

怎样读历史古籍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中华书局

200419396



责任编辑：黄 松

文史知识文库
怎样读历史古籍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9⁷/₈印张·2插页·200千字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9.50 元

ISBN 7—101—01126—8/G·40

新
华
书
局
PDG

写在《文史知识文库》之前

这套书本来是以“文史知识丛书”的名义出版的，现在改成“文史知识文库”。“丛书”改成“文库”，目的是使这套书容量大一些。把这套书编得更充实、更丰富，不仅容纳《文史知识》已经刊发过的较好的内容，还要容纳《文史知识》未能刊发的好内容。我们的计划是深入浅出地、重点而又系统地介绍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丰硕成果。

我们的时代日新月异。科学技术革命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国人民重振雄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祖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酝酿着新的崛起，新的振兴。

在这一巨大变革中，在计算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超导体、遗传工程等纷至沓来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深深感觉到无所不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如此的丰厚，以至于我们伴随着一项现代化工程的伟大胜利，几乎都要想起我们的前人，想起为我们编写了中华民族灿烂篇章的人们。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六朝的丰碑巨制、韩柳欧苏的大块文章、明清之际的人生画卷，无不表现了对社会国家的情怀，对宇宙世界的期待。这千古风流人物的搏斗，相互辉映，激荡交融，造成了光华灿烂的中国，博大久远的中华民族传统。这是

2055/29

成了光华灿烂的中国，博大久远的中华民族传统。这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民族凝聚、发展、强盛的力量。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总离不开我们站立的祖国大地。我们都是伟大祖国的儿女，对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对我们祖先繁衍发展的土地，怀着深切的挚爱之情。爱她，了解她，同时研究她；在了解她、研究她的过程中渗透着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信念。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重新崛起的决心，把祖国的传统文化放到整个世界文明的背景之中，我们一定会更准确地找出精华，区分糟粕，在看来杂乱无章、盲目被动的历史表象中，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为我们今天的创造活动服务，为我们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服务。

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作者和我们一起编好这套文库，共同去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目 录

出自地下的古史《竹书纪年》	盛冬铃(1)
周史遗珍须细读——《逸周书》简介	缪文远(8)
《史记》、《汉书》比较	瞿林东(16)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	詹鄞鑫(25)
谈谈记述南北朝史事的“八书”、“二史”	瞿林东(28)
《旧唐书》与《新唐书》优劣之比较	葛兆光(45)
中西交通史的名著——《大唐西域记》	洪 偶(54)
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	何珍如(58)
《史通》读法	程千帆(65)
怎样阅读新、旧《五代史》	王树民(71)
《十国春秋》的编纂特点及其价值	朱仲玉(79)
怎样读《资治通鉴》	王树民(86)
宋代四大书之一《太平御览》	戚志芬(94)
宋代最大的类书——《册府元龟》	陈炳远(102)
一部采摭繁富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	杨济安(109)
研究南宋史的一部要籍——介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王瑞来(116)
《金史》试析	朱仲玉(121)

《元朝秘史》的流传与价值	亦邻真(128)
研究元史的重要参考书——《元典章》	韩志远(136)
我阅读《明史》的一些体会	许大龄(141)
《永乐大典》和它的价值	张忱石(150)
《国榷》的一些特色	郑克晟(159)
利玛窦及其《中国札记》	谢方(166)
中国最早的有系统的学术史专著——《明儒学案》	任大援(176)
顾炎武的《日知录》	孙钦善(181)
顾祖禹和《读史方輿纪要》	杨济安 杨忆坪(190)
《廿二史札记》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	施丁(197)
谈谈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仓修良(205)
《考信录》——探索科学古史体系的先导名著	陈其泰(212)
第一部探索清代盛衰的史书——《圣武记》	陈其泰(219)
一部有价值的近代史料书——介绍《光绪朝东华录》	李志英(228)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李世平(232)
“三通”	曾贻芬(241)
《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提要辨证》	余淑宜(247)
打开历史宝库的一把钥匙——《书目答问》及其《补证》 介绍	骈宇騫(254)
考史必备的工具书——《二十史朔闰表》	刘乃和(258)
《历代职官表》与官制史料	潘树广(268)
明清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韦庆远(277)

稗官小说与野史杂记	刘叶秋(288)
如何利用明清的野史笔记	任道斌(299)

出自地下的古史《竹书纪年》

盛 冬 铃

出 土 与 整 理

《竹书纪年》是西晋时从古墓中发现的一部先秦纪年体史书。要认识这部古史的价值，应该先对它的出土情况和整理经过有个大致的了解。

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十月，汲郡汲县(今河南省汲县)的一座战国时魏王的墓葬被盗。盗墓者意在取得魏王殉葬的宝物，却使在墓中沉睡了五百多年的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得以重见天日。这批竹书，据说当时整整装了几十车。汲郡地方官吏向朝廷报告了有关情况，把竹书和同出的钟、磬、玉律(定音器)、铜剑等物品一并送往首都洛阳。晋武帝对这一发现颇为重视，命令把墓中出土之物全部“藏于秘府”。但那时正忙于筹划大举伐吴的军事，相对而言，整理竹书是不急之务，所以一时顾不上着手进行此事。

至太康二年(281)春，已完成统一事业的西晋王朝为了标榜偃武修文，正式命令校读编理这批竹书，并把它们由古文写定为当时通行的隶字。先后参加编校写定工作的有荀勖(xù)、和峤、挚虞、卫恒、束皙等人。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

者,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那时见到的竹书是什么样子的呢?有关资料记载,竹简用素丝编联成册,每简长度约合晋尺二尺,战国古尺二尺四寸,一简四十字,分为两行,每行二十字,用黑漆书写。年深月久,编丝难免朽断,而盗墓者在墓穴中不仅扰乱了简册的次序,甚至燃烧竹简当作火把,结果“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詮次”(《晋书·束皙传》)。简上的文字是用战国古文(蝌蚪文)书写的,这种文字久已废弃不用;荀勖等虽然有魏三体石经^①中的古文可以对照检寻,也不能全部认识。整理者们态度审慎、谨严,从武帝太康二年至惠帝永康元年(300),前后经过约二十年的努力,才把所见竹书全部整理完毕,共编校写定古书16种75篇,包括《易经》、《穆天子传》、《周书》、《国语》及各种杂书,计10余万字。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十三篇编年体的史书。这部史书记有夏商周三代之事,周幽王被犬戎所杀,西周灭亡,即接以晋国纪年,至战国三家分晋后,则用魏国纪年记事,至“今王二十年”而止。所谓“今王”,据世次推算,为魏襄王。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年。竹书所出之墓可能就是魏襄王墓。显然,这部纪年体史书是魏国的历史记载,整理者名之为《纪年》,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由于它出自汲县的古墓,所以又称《汲冢纪年》。

“古本”与“今本”之别

《竹书纪年》有“古本”、“今本”,这是必须予以区别的。

① 三体石经又称正始石经,三国魏正始二年(241)立于洛阳太学,包括《尚书》、《春秋》二经及《左传》的一部分。碑文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刊刻,其中古文乃据《说文》所收古文以及当时能见到的战国文字资料勘定。

《纪年》的整理本一开始就有荀勖、和峤初定本和束皙改定本之分。在编定过程中和编定之后，一些学者公开讨论，各抒己见，相互辩难。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当时通行的12卷本《纪年》后附《竹书异同》1卷，即是不同意见的汇录。这部古史的重新问世，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极大兴趣。西晋名将、经学家杜预在完成了他的巨著《春秋左传集解》后得见荀勖、和峤初定本《纪年》，发现其中许多史事可与《左传》相印证，十分兴奋，即在《春秋左传后序》中表彰此书，并指出“虽不皆与《史记》、《尚书》同，然参而求之，可以端正学者”。但是，由于《纪年》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与传统说法尤其是儒家经传差距很大，这就使它遭到持保守态度的儒家正统学者的排斥，逐渐由显而晦，所谓“舛(chuǎn)驳不纯、世颇疑焉”(《罗泌路史》)，唐以后已不为世人所重视。经唐末五代战乱，至宋代已只存残本3卷。大约到宋末元初，连残本也全部亡佚了。

然而到了明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编的《竹书纪年》。它是抄录散见于类书、古注中的《纪年》佚文，又杂凑某些古书中的内容而成，并把《宋书·符瑞志》改头换面作为注解，冒称南朝人沈约所注。这种编成于元代或明初，明清以来通行的本子，显然不是汲冢古史的本来面目。

为了去伪存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竹书纪年》的原貌，从清代的朱右曾开始，一些学者致力于对《纪年》原本的辑佚工作。所据材料，主要是撰成于南北朝以迄北宋的一些古书注解，如《山海经》郭璞注、《史记》三家注、《水经》酈道元注、《汉书》颜师古注、《文选》六臣注等，以及《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和少数地志、文集、史书。这些

古注、类书等的撰者、编者曾亲见《纪年》原本，并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所引证。从这些著作中辑录已经亡佚的《纪书》遗文，所得应是原本真正的内容。把用这种方法辑得的《竹书纪年》原本佚文汇集编校，所定之本称为“古本”；相对而言，明清以来通行的本子则称为“今本”。汇编的“古本”，以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为最早，近代学者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对朱书有所增补，今人范祥雍又续加订补，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方诗铭、王修龄所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总结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内容最为完备。

古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

探讨《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应以“古本”为根据。

我国的编年体史书，很早就出现了。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序》中说：“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又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春秋战国时，各国都有自己的编年史，这种编年史往往通称为“春秋”，但也或有别名，如《孟子·离娄下》所言，“晋之《乘》，楚之《梼杌》（*taowu*），鲁之《春秋》，一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史记·六国年表序》）由此，先秦的编年史销毁殆尽。至汉初，除鲁之《春秋》外，其他诸侯国的史书差不多都已不可闻见了。《纪年》作为战国时魏国的编年史重现于世，真如凤毛麟角，极为珍贵。《纪年》整理本问世后不久，司马彪即据以驳正了谯周《古史考》中的122条可疑的记载。近百年来的学者尤其重视利用《纪年》的材料来订补古史，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纪年》所记史事依时代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夏商周三代之事，二是春秋之事，三是战国之事。战国部分时代最近，所记最为详切。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战国田齐自田成子杀简公专国政，至秦兵入临淄齐王建出降国亡，共历十世，但《纪年》则记为十二世。证以《庄子·胠篋》“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的记载，显然《纪年》的记载是正确的。至于魏国列王的世次年数，《纪年》所记更是确凿可信，如说魏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称王改元，又十六年始卒，这一材料不仅补充了他书未及的史实，又可纠正《史记》把惠王后元记为襄王年数的重大错误。由于司马迁当时已不易见到先秦史书，所以《史记·六国年表》颇有舛乱之处，且与各《世家》和其他文献记载矛盾不合。因此，清代和近代学者把重订战国年表当作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要重订这样一个年表，无疑不能脱离《纪年》所提供的材料。

《纪年》所记春秋史事，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可能即依据孟子提到的晋《乘》，这一推断已为许多学者所信从。晋《乘》与鲁《春秋》性质相似，年代相仿，内容更可互相印证。今见古本《纪年》的材料正有大量记载与《春秋》经传相合，如称“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即《春秋·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事；称“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事；称“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即《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事。凡此，都足证《纪年》记载的可靠。又如《纪年》记越国的世次为：“不寿立十年见杀，是为盲姑，次朱勾（gōu 勾）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则说：“王不寿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究竟孰

是孰非，不寿下一世越王的名字是朱句还是翁？传世的与新出土的两柄越王州句剑铭文称“越王州句自作用剑”，州、朱两字古音同，州句就是朱句。可以肯定，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一位名叫“朱句（州句）”的越王，还是《纪年》的记载正确。

《纪年》关于夏商周三代史事的记载由于年久世湮，有些只是依据传说，未必尽是史实。但其中也有不少材料是很有价值的。例如《尚书·无逸》中提到的商王“中宗”，《史记·殷本纪》认为是太戊，《纪年》则称“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殷墟卜辞出土后，人们发现甲骨文正有“中宗祖乙”四字连文，《纪年》所记得到了证实。又如，西周共和以前列王的年数已难确考，而《纪年》如下这条记载可给人以启发：“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所谓“再旦”，是日全食过去后的复明。我们知道，在某一特定地区见到日全食是十分难得的，往往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遇到一次。而利用现代天文学的知识完全可以推算出历史上某一地区见到日全食现象的确切的年、月、日、时。当代学者董作宾、陈梦家等就依据“天再旦于郑”这一线索算出了周懿王元年的绝对年代，在重建西周年历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由此可见，古本《纪年》虽然是一辑佚本，并不完整，但对于考订先秦的史实，仍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如何看待“今本”《竹书纪年》

“今本”《竹书纪年》经历代学者的甄别，特别是经王国维利用阎若璩疏证《伪古文尚书》的方法，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把今本《竹书纪年》中杂凑他书冒称原本的材料一一指明

其出处以后，“是犹捕盗者之获得真赃”，其为后人重编作伪，已灼然大明于世。但“今本”的编定在六百多年前，编者当时能看到的原本佚文自比近代、现代人为多，有少数只见于“今本”的材料可能实有所据而并非向壁虚造，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利用“今本”的材料必须慎之又慎，因为它毕竟大失原貌，早已不是那部真正的出自地下的古史了。

周史遗珍须细读

——《逸周书》简介

缪 文 远

一、《逸周书》是否出自晋代古墓？

现在流传的《逸周书》原名《周书》，东汉以后，它又有两个名称，一是《逸周书》，因为它是《尚书》中“周书”的逸篇；一是《汲冢周书》，因为据说它出自晋代汲冢（郡治在今河南汲县西南）古墓。谁是谁非，值得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逸周书》从西汉以来，流传不绝，并非出于汲冢。《汉书·艺文志》就著录了《周书》71篇，颜师古注说：“今之存者，四十五篇”。东汉许慎著《说文》，五次引用《逸周书》；郑玄注《周礼》，曾引用《周书·王会》；蔡邕在《明堂月令论》中曾提到《周书》的《月令》第五十三，和今本的篇第完全相合。以上流传情况，表明《逸周书》并非在晋代以后才出现于世，所以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周书》，《隋》、《唐志》系之汲冢，而《束皙传》及《左传正义》引王隐《晋书》所载竹书之目无《周书》，然则系于汲冢误矣。”清《四库全书总目》也说：“《晋书·束皙传》载竹书75篇，具有篇名，无所谓《周书》。”

另一种意见，认为汲冢魏墓所出，确有《周书》。《晋书·

束皙传》载，汲冢所出的书，其中有杂书 19 篇，包括《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四种，分明有《周书》在内，有人把《周书论楚事》合二而一，是错误的。《晋书》所说的 19 篇，应当是 19 卷，一卷包含若干篇。汲冢竹书的整理者之一、西晋秘书监荀勖撰《中经新簿》（著录西晋皇家藏书的目录），把汲冢书列于丁部之末，《隋书·经籍志》载有《汲冢周书》10 卷，就是沿袭《中经新簿》而来。可见汲冢所出，经当时学者隶定（把战国古文考定后写成晋代文字）的，实有《周书》10 卷，这是无可怀疑的。

以上两种说法，各自都只看到问题的一面。实际上，《周书》在晋代当是有两种传本，一是汉代传下来的今隶本（当时文字），一是汲冢所出的古文本（战国时东方六国文字）。晋五经博士孔晁为《周书》作注，就曾用汲冢本和旧本对校，校语中标明两本的文字异同。今本各篇篇名都有一个“解”字，就是孔晁作注解时加上的。《新唐书·艺文志》既载有《汲冢周书》10 卷，又载有孔晁注本《周书》8 卷，反映了两本同时流传的情况。汲冢 10 卷本是白文无注本。孔晁注本唐时已有残缺，前引颜师古注《汉书》说《周书》“今存者四十五篇”，就是指孔晁注本而言。

在颜师古以后，孔晁注又散失三篇。自宋代以来，有人把汲冢本和孔晁注本合并，去其重复，有孔晁注的 42 篇，无注的 17 篇和序 1 篇，合成今本 60 篇。与《汉书·艺文志》相较，亡佚了 11 篇。今本《周书》无注的 17 篇和序 1 篇，赖汲冢本的补充而得以保存，真是艺林幸事。从《周书》的流传看，把它称为《逸周书》或《汲冢周书》均无不可。